

Study on th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f Rural Basic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Concentric Circles of Party Building” in Maozhushan Village as an Example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共同体建构研究：以毛竹山村“党建同心圆”为例

Xinyong Lu ^{a,*}

^a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Building, Rural Grassroots

关键词

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 共同体建构, 农村基层

ABSTRACT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s crucial for China's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s modernization advances, constructing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s has become urgent. Many regions are innova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th party-building playing a key role. This paper examines Maozhushan Village's "Party-building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 as a case study, analyzing its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multi-party risk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s effective practices for party-led rural governance and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y-building and rur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party-led rural governance..

摘要

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社会治理问题,特别是农村社会治理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备受关注的焦点。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农村社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治理困境。因此,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提高农村治理水平,实现农村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议题。在应对各种治理困境的同时,我国各地区都带着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了新一轮的探索。尤其是建设以党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更是一项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些创新举措不仅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把共同体建构作为切入点,对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行研究,本文以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为例,以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为研究对象。从毛竹山村党建工作中的“党建同心圆”案例看毛竹山村党组织建设现状、多方主体隐性风险探微、党建同心圆实施举措等方面剖析,最后归纳出了毛竹山村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有效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对“党建引领”和“乡村治理”的二元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对毛竹山村带有中国特色的“党建同心圆”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本文旨在为深化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研究案例村情概况

毛竹山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西侧。全村共有 1237 户、4378 人,设有两个党总

支部,党员总数为 128 名。二十年前,毛竹山村是全州县最贫困的村庄之一。由于长期没有修建公路,村民主要依靠种植稻米和外出打工为生,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当地曾流传一句话:“泥瓦砖、生活苦、南瓜汤、有女不嫁到毛竹山村。”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2984593656@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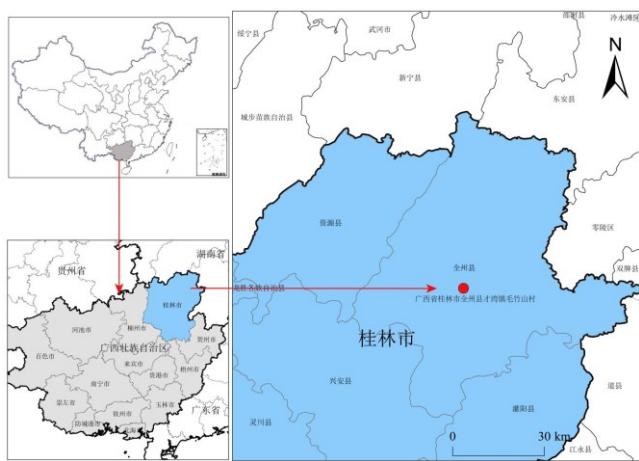


图 1 毛竹山村区位图

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ArcGIS 制作）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网站下载的审图号：GS(2020)4630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随着葡萄产业的发展，毛竹山村的经济状况和整体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村里推行了党建同心圆模式，即“基层党组织+党群理事会+村委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整体性治理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的进步。村里还创建了“千年酸枣树”、“毛竹小路”、“桂花路”等景点，进一步提升了村庄的吸引力和美观度。通过党建品牌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风貌提升等一系列措施，毛竹山村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在乡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村庄的整体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乡村从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民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提升。毛竹山村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党建引领下通过产业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贫困村庄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研究

目前，“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实现战略与治理方式机理上，多位党建学、政治学等方面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韩福国提出，基层党建的实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把开放的党建融入到具体的社会治理之中，从而建立起“党社双向开放”的结构^[1]。潘泽泉认为，要从“静态”到“动态”，由“组织”到“职能”的转换^[2]。孔凡义依据农村居民的需要与参与度，将其分为“协商式”“主导式”“自治式”三种，突出了党与社会自治相结合，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3]。彭勃则提出构建“党社双向

开放”的治理架构，以解决“结构性割裂”问题^[4]。阙为表示，以社区党委为领导核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的城市管理模式已经基本成型^[5]。总体而言，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打破结构约束，构建开放的、双向的、互动的治理架构，可以有效地加强基层和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

2.2. 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建立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之上的，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角度，聚焦于乡村治理领域。它既有别于城市社区，也有别于网路虚拟空间的治理社群，因其具有特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特征。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还很少，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成果也不多见。有关“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多是以概念解释为主。郁建兴将“社会管理”取代为“社会治理”，并将其视为“合作”与“协商一致”这两个基本元素，并以此作为其价值诉求^[6]。具有共同治理目的的多个主体自觉地结成相互促进、关系稳定的团体，被称为社会治理共同体^[7]。李庚香认为，在乡村治理中，各主体的行为、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追求的是共同的管理目的，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局面^[8]。张国磊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视角，以农村基层治理为切入点，以习俗认同、乡村契约认同为基础，以具体任务为目的，建构起一个在价值、组织、行为上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体^[9]。农村治理共同体是由自然、行政和权力三个维度组成的，它是由多个主体共同组成的，通过公正民主的治理来推动村庄的善治^[10]。

2.3. 研究述评

目前，学术界围绕着“结构和治理”两个重要的角度，对“党建结构嵌入治理”、“党组织多元吸纳”、“党建功能型”和“服务型党建引领”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发展相对成熟的城镇社区，忽视了作为党建领导力量薄弱的乡村基层，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力量的整合、乡村一体化治理架构的构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推进等问题的研究相对匮乏。与此同时，现有研究或从顶层设计、政策安排等方面对党建引领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解读，或仅从微观层面对各个主体的作用进行了简单的讨论，缺乏中观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此外，已有研究对其目标定位不清，且二者在治理架构上存在交叉复合、互补的特征。所以，对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社区建设进行研究，必须把它和农村基层治理的目的结合起来，是一项有创新性研究价值的课

题。最后，“以党建引领为中心”的中国特色化乡村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要根据中国国情做出有针对性的解释。

3.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诠释

3.1. 提出问题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1. 在毛竹山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过程中，毛竹山村应如何搭建一个以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并对不同的治理主体进行协调的实践路径？
2. 毛竹山村基层党建建设中如何动员群众参与，构建一个适合该村新型的“共治”机制？
3. 毛竹山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中，如何认识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和多种治理机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2. 理论诠释

3.2.1. 协同治理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赫尔曼·哈肯首次提出协同理论，该理论描述了系统内部各环节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整个系统的功能^[11]。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交叉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协同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将协同效应进一步放大^[12]。协同治理是一种综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的创新性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协作、协调和协商等方式，共同达成治理目标^[13]。该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合作，通过动态平衡和资源整合，实现高效和可持续的治理^[14]。协同治理理论作为治理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强调多方参与和协同合作，以实现善治^[15]。与传统善治理论相比，协同治理理论在理念、方法以及技术手段上具有更多优势^[16]。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协同治理理论着重研究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不同治理主体在不同程度上的积极性^[17]。乡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更有利于推动形成稳定的乡村社会关系^[18]。乡村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乡村治理结构，其核心在于通过各主体间的协同治理，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整合^[19]。在这种治理结构中，各主体通过协同合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乡村治理中的复杂问题^[20]。这种协同治理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增强了各治理主体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1]。

3.2.2.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在批判古典城邦政治共同体理论和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是指在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种联合状态，被赋予了个体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理念价值^[22]。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共同体理论与人的社会性本质紧密相连，共同体的目标与个人的发展目标并不冲突。个人的劳动和生活依赖于共同体的内聚力，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需要个人的自由发展来推动；个人需要在共同体中实现自身价值，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也在推进共同体的发展。这种互动关系在乡村治理中尤为重要。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调动乡村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不仅仅是为了振兴乡村，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23]。在我国，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指向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两者并非对抗性关系^[24]。此外，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子系统，农村基层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扎实推进，成为保障国家现代化发展和社会稳定运转的有效实践。

3.2.3. 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

从党中央的政策部署来看，我国社会治理思想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演进过程^[25]。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领导人首次提出构建“社区社会”，并将“民主协商”、“科技支撑”、“人人享有”四个主要内容纳入其中^[26]。可见，“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包含了深远的国家管理历史和社会发展经验的积累。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与功能更加清晰，权责利关系更加明确^[27]。本文试图从农村基层作为可视化的治理场域出发，将治理共同体视为一种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在治理过程中，坚持党的“自治”与“他治”相互作用，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体系^[28]。党建引领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建设新时代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一项重要实践战略。

4. 案例分析

4.1. 毛竹山村党组织建设概况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质量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效果有直接影响。在毛竹山村的产业发展和规划中，党员干部发挥着“领头雁”的关键角色。基层党组织通过走访调查，通过广泛征求毛竹山村村民意见和建议，确定了在村民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党员群体名单，并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了毛竹山村的“乡村振兴”党群理事会成员，辅助基层党组织完成乡村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如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公益事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毛竹山村创立了党建同心圆模式，组建了“党群理事会”，并采用“开门征集意见、议定议题、召开村民大会、集群众智慧、集体决策、统一执行”的“五步议事”方式，同时建立了“村规民约”、“村民议事”和“矛盾解决”三大制度，切实履行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职责，发挥了组织建设的作用，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4.2.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主体隐性风险探微

4.2.1. 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足

在对毛竹山村党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乡村治理任务越来越重，管理对象越来越多，需要服务的管理对象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村两委的力量明显不够，党员的积极性也很难被调动起来，同时，在服务人员和乡村社会资金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面对频繁发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时，单纯传统的党组织单一治理管理模式、不健全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很难形成迅速、高效的处理方案。与此同时，在民间社会组织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党组织覆盖会逐渐暴露出盲点；在就业经济发展的今天，流动党员没有组织挂靠、党费没有地方缴纳、每个月党组织要求的党日活动没有场所开展。许多村党支部在面临上述问题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无奈。基层党组织治理管理能力的缺失，已成为制约了毛竹山村有效治理的瓶颈。总结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缺乏有效的领导，导致党建主体与其他农村乡村治理主体的分离；二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制约着毛竹山村整体党组织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三是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党的发展需要。

4.2.2. 党建主体治理权威弱化

为了让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能更好地融合，实现凝聚群众、引领乡村综合发展的目

标，这就要求党建主体要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塑造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权威。通过对毛竹山村“党建同心圆”案例的分析，我们发展，由于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权威被削弱，使得它难以在乡村多元共治领域内发挥其政治作用，成为构建“党建同心圆”的动力起点。首先，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缺乏有效的组织保障，具体体现在党员队伍建设不够强大，党员队伍结构失衡，党组织涣散，党内生活虚化，一些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减弱等等。其次，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思想观念比较陈旧，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在服务和创新方面还比较欠缺，习惯于采用行政命令和社会动员的方法来开展工作，不擅长灵活的治理，缺少与群众的沟通、动员和组织。另外，在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着“粗放化”的党建工作形式，党建工作内容与农村治理需要不相适应，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发展的引导作用较弱，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较差。

4.2.3. 村民自治参与不足

毛竹山村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素质水平的村民在参与村民自治方面有一定的差异。相对于乡贤治村，治村过程中的普通村民在话语权力和参与效能感方面存在着主体性的缺失和行动的乏力等问题。这一长期困扰着村民参与的难题，使其在乡村治理中丧失了应有的生命力。与乡贤积极参与村庄治理的情况相比，普通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度和参与效率感都很低，这就是公众对村庄建设的意愿和动力不足，积极性和积极性都很低。乡村民众反映，“乡贤”在农村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其实是少数人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一般村民由于缺乏“实力”，话语表达受到限制，诉求得不到回应。以毛竹山村“党建同心圆”机制改革之前的农村治理成效为例，研究发现，由于村民自治主体之间的不平衡，再加上民众在乡村建设中的参与感和参与力的不足，导致农村基层治理逐步失效，治理秩序出现混乱，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法治性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农民在基层组织中的话语权与行为空间受到挤压，从而影响到农村基层组织的有效性。

4.3. 乡村治理“党建同心圆”共同体建构的微观行动

在毛竹山村，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面临着权力与能力缺失、村民参与缺位、乡贤治村无序等问题。毛竹山村结合村里实际情况，主动回应人民的呼声，在党和政府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率先探索并推行了由“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小组、村民代表直接参加”

的“圆桌会议”模式，代替原来的“村委会主任”工作模式，为解决“村治难”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随后，毛竹山村党委对村民小组成立党的圆桌会进行了调查和总结，并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整合，让各种类型的社会力量都能参与进来，让多个主体共同进行管理，逐渐形成了一个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的“1+1+S党建同心圆”治理模式。(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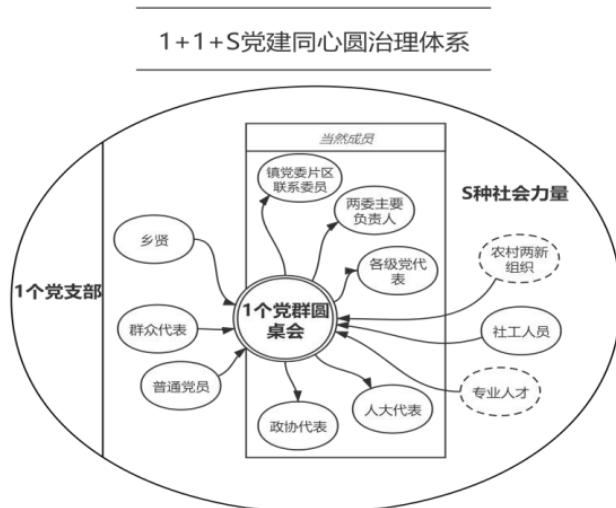


图 2 毛竹山村党建同心圆治理共同体建构示意图

在毛竹山村开展“党建同心圆”的实践探索中，党的组织圆桌会议为毛竹山村探索了一条新的思路。2021年底，毛竹山村党委在总结其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乡村治理的重点是村民小组，搞好了，乡村也就有了良好的治理；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凝聚党心、凝聚人心，才能巩固基层政权，促进经济发展。”2022年，毛竹山村党支部以此为基础，以“基层党建融党心、汇人心”为主题，由镇党委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牵头，在各村推行“下沉式自治”——村民小组治理圆桌会议化主题的创新探索，对各种问题根源及“耿飚之间”进行反思。毛竹山村党委参照延安时期“党政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平等对话”的典型事例，将毛竹山村党组织建立在党群关系平等，遇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再做决定，与村民一起共同生活劳动三个原则基础上，系统化、项目化地推进党建工作。

党群圆桌会是一种长效的基层组织形式，它是一种新型的基层组织形式。镇党委、政府工作人员以党员身份参与党的“圆桌会议”，一方面帮助村民将上级的政策传递给村民，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二是听取民意，听取民意，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情况。其次，由街道、社区、街道、社区等多个层面的社区参与，并将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并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专业讨论。通过这些措

施，党建圆桌会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拓宽群众诉求渠道、培养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创新社会管理和推进农村反腐的有效载体。镇党委领导重视并大力支持，毛竹山村逐步构建起了“1个支部+1个党员圆桌会办事系统+S种社会力量”的“1+1+S”农村末端治理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调解了矛盾和纠纷，调整了产业结构，强化了干部队伍(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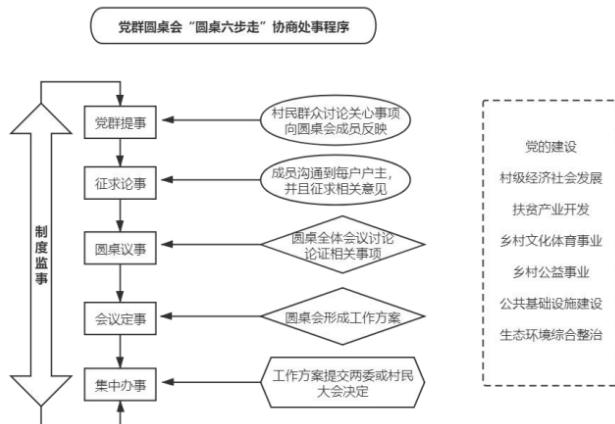


图 3 毛竹山村党群圆桌会“圆桌六步走”协商处事程序

村民主体是乡村社会建设的基础治理单元，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毛竹山村的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主体不断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在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下，成立了具有村民自主建设、内生性和非正式特征的群众自治组织——党群理事会。毛竹山村党群理事会的会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民主选出，具有高威望和奉献精神，言而有信。通过建立“党群理事会”，村民们常在党群活动中心聚集，商讨村庄事务，实现了“村官管理”向“村民自治”的转变，解决了村庄管理脱节、村民表达诉求渠道狭窄以及乡村非专职党员作用缺乏的问题。在毛竹山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毛竹山村党支部委员和党群委员会是实现村民利益最大的组织。他们集中了全村的力量，对村子里的安全、消防等方面定期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以定期召开党员大会的形式确保有效落实。党群理事会在原有村规民约基础上进行创新，组织村民主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纠纷，通过群众评论、村民评议等方式展开调解，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阶段，充分发挥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最终造就了一个和谐友爱、齐心协力的乡村社会。

5. 思考与建议

5.1. 建强组织，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主体

农村基层组织由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政府行政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构成。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既是农村基层党建的主要力量，又是农村基层党建的主要力量、农村治理的领导者。以毛竹山村“党建同心圆”模式为例，以区域化党建治理为核心，构建基层党建组织体系，破解村级党组织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不和谐。以“横到底、纵到底”为组织原则，构建“1+1+S”区域化“同心圆”式党建管理体制，构建了“横到底、纵到底”的网络型治理架构。通过对基层党建资源的整合，整合不同的管理主体在信息、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建立起一个协同共治的党建社区，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水平。完善村级民主议事和协商机制，对党员圆桌会、“红色乡贤参事会”等载体进行创新。利用“1123”夜间回访制度，对村干部履行职责进行量化评估，达到由“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的转化，促进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5.2. 群众为本，提升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能力

农村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参与者，自治管理体系能否顺利运转，最终取决于参与者自身的能力。这要求村民具备较高的自治能力，包括在治理过程中进行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一方面，要有目标地加强村民的相关知识储备和管理能力，尤其是在农户中把握“少数关键”；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乡贤”，将关心乡村发展、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组织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指导村民自治，成为村组带头人。此外，要在广大群众中争取“绝大多数”，不断培养农民的综合知识和技能，提升他们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的综合素质。要开展多样化的课程，注重提升村民自治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相关技能，并引入激励方式，促使村民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搭建好平台，鼓励年轻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为村民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村两委应做好集体经济发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党群理事会等农村社会组织要主动协助党组织，利用各类平台，向群众宣传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并定期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让发展集体经济的理念逐渐影响村民，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建设。

5.3. 组织整合，党建引领下多方主体协同共治

通过“吸纳”、“协商”与“合作”三种方式，在毛竹山村构建“同心圆”，使农村治理在资源与主体上得到有效整合，打破了“多重治理碎片化”的困局，

促进农村治理系统的系统提升与现代化转型。具体而言，毛竹山村通过将各种类型的社会工作者组织纳入到乡村治理社区中，并将其广泛地纳入到社会管理之中，从而建立起了一张立体的乡村治理网络。通过引导多元协商，建立党员与群众的平等地位，开展圆桌协商，完善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治理协商体系，构建“党群提事、圆桌议事、民主监督员”的全过程、全方位基层协商模式，使村庄内部的多元主体组织融合；强化村级集体经济资源（如山林地滩等资源性资产、集体产业、经营事业等）在“党建同心圆”管理模式下强化村级集体经济资源配置的统筹调配，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References

1. Han, F., & Zhang, K. (2015). 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 [The domain of 'consultation' and mechanism of 'democracy' in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practical structure, and theoretical critique of grassroot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浙江社会科学*, (10), 48 - 61, 156.
2. Pan, Z. (2021). 政党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社会治理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CPC's lead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governance].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7(04), 31 - 40.
3. Kong, F., & Ruan, H. (2022). 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 [Mobilization, embedding, and integration: Three mechanisms of party-l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学习与实践*, (02), 83 - 91.
4. Peng, B., & Du, L. (2022).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Super-political governance': The logic and pathways of party-l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理论与改革*, (01), 59 - 75, 156 - 157.
5. Kan, W., & Qian, W. (2021).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公众参与：理论逻辑与嵌入路径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ies: Theoretical logic and embedding paths]. *贵州社会科学*, (08), 88 - 95.
6. Yu, J., & Ren, J. (2020).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Commun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s realization mechanism]. *政治学研究*, (01), 45 - 56, 125 - 126.
7. Li, G. (2017).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体会之一 [Developing a healthy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purify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Learning insights from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领导科学*, (31), 4 - 10.
8. Zhang, G., & Zhang, X. (2017). 制度嵌入、精英下沉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桂南 Q 市“联镇包村”的个案考察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elite sinking, and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from Q City in southern Guangxi]. *公共管理学报*, 14(04), 44 - 53, 155.

9. Xi, J. (2022, October 26).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人民日报, (001).
10. Haken, H. (1995). 协同学: 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Synergetic: The mystery of natural structure] (L. Fuhua, Trans.).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 Gao, R. (2021). 我国地方政府金融风险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financial risk in local governments]. 领导科学, (20), 115 - 117.
12. Gao, W., & Zhang, H. (2021).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in constructing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中州学刊, (02), 7 - 12.
13. Hao, Y., & Shuang, C. (2021).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Constructing a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Logic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江海学刊, (01), 146 - 151, 255.
14. Tao, Z., & Shan, B. (2021). 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 内涵、逻辑与策略——基于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的思考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Connotation, logic, and strategy based on the party-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治理现代化研究, 37(01), 76 - 83.
15. Wang, P., & Tang, B. (2020). 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 T 市 B 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 [Mechanisms for constructing grassroots party governance authority: Based on governance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B district, T city]. 管理世界, 36(06), 106 - 119, 248.
16. Liu, H. (2020). 乡村多元共治的内在逻辑、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向——以首批 20 个典型案例为对象的分析 [Internal logic, operational rul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ural multi-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the first 20 typical cases]. 中国发展观察, (22), 67 - 70.
17. Chen, L., & Li, Y. (2018). 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 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 [De-floating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novative logic and typology of party-le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探索, (06), 109 - 115.
18. Cao, H., & Cao, Z. (2020). 新时代村级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Practical logic of village-level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探索, (01), 109 - 120.
19. Cao, H., & Bao, C. (2020).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Build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ies: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理论探讨, (01), 12 - 18.
20. Li, Y., & Yuan, X. (2020).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Construction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ies in the new era]. 云南社会科学, (01), 18 - 23.
21. Shao, F. (2014). 马克思“虚幻”共同体思想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研究 [Nation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oncept of the 'illusory' community]. 社会主义研究, (04), 9 - 14.
22. Wu, Z., & Wu, Y. (201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世界经济与政治, (03), 4 - 33, 155 - 156.
23. Shi, Y. (2016).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及其发展 [Marx's concept of social community and its development].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01), 23 - 28.
24. Hu, X. (2020). 民主协商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价值、实践与路径分析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Value, practice, and path]. 河南社会科学, 28(09), 25 - 31.
25. He, D., & Wu, X. (2022). 赋能型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有效实现方式——以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Empowerment-based governance: An effective model for buil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ies—A case study of Shiquan County, Shaanxi]. 农业经济问题, (06), 134 - 144.
26. Liu, W., & Weng, J. (2020). 撕裂与重塑: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技术治理的双重效应 [Tearing and reshaping: The dua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探索与争鸣, (12), 123 - 131, 199 - 200.
27. Xiong, W., & Fang, Y. (2019). 体系化: 当代乡村治理的新方向 [Systematization: A new direction for contemporary rural governance]. 浙江社会科学, (11), 41 - 50, 156.
28. Cai, X. (2024).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party-led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building] [Master thesi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9. Shi, Q. (2022). 基层党建引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 [Optimizing the path of party-led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self-governance] [Master thesi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 Wu, J. (2021).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led by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Master's thesi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31. Xi, J.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Report a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党建, (11), 15 - 34.
32. Gao, R., & Dong, H. (2024). 组织、利益与情感: 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 H 镇的实证案例 [Organization, interest, and emotion: Practical pathways of governance communities dri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An empirical case from H town, Guizhou].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4(03), 30 - 38.
33. Xu, C., Wang, L., & Wang, X. (2024). 新时代党建引领激活乡村治理活力研究——基于全国第六届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的分析 [Revitalizing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 6th national model cases of grassroots party innovation].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 12.
34. Chen, W. (2024).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real paths of party-le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02), 20 - 37.
35. Xie, X., & Zhang, R. (2023). 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省思 [Introduc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party-led rural governance]. 理论月刊, (12), 66 - 77.